

控、利益关系混乱、消极的文化诱导、主体价值观念偏误等都是产生腐败的原因。如黄百炼认为转轨换型时期新旧体制的交接不到位,而形成的“交叠”现象是腐败产生的社会历史条件;剥削阶级思想的影响是重要的思想根源;民主监督、廉政制度和经济管理制度的不配套是制度原因;地方保护主义和部门保护主义以及政府职能转换中的不规范行政行为是组织管理原因;个人人生观、价值观的偏离是主观原因(《遏制腐败——民主监督的程序和制度研究》,人民出版社 1997 年版)。甄小英强调在转型期,社会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领域存在着传统因素和现代因素的二元结构,在运行中呈现出过渡性和不稳定性,二者冲撞,造成社会的某种失序、人们思想的某种混乱、心态的某种失衡等,它们是腐败现象产生的重要因素(“我国转型期腐败现象的成因及特征”,《理论学习与研究》,1994 年第 4 期)。另外,还有的学者专门从某一视角对转型期腐败现象或特定领域腐败现象发生的原因进行分析。前者如薛木铎着力从经济转轨所呈现的五个特点即市场体系发育的不健全、经济活动中的空档漏洞、国有企业财产的产权关系不明晰、多种经济成分并存条件下的不规则竞争、市场经济的负效益等来分析腐败产生的经济根源(“关于新旧经济体制转换时期反腐败斗争的几个问题”,《学习与实践》,1994 年第 3 期);何增科运用制度分析法探讨了转型期腐败的成因,即以经济人和理性选择的假设为出发点,分析个体选择或个体行为的动机和条件,并从激励机制、机会结构、约束机制的缺陷分析个体腐败背后的制度性原因(《反腐新路——转型期中国腐败问题研究》,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2 年版);刘烨从人性的角度即当代中国人的利益需求、价值信念、心理因素、本质异化等方面对中国社会腐败现象所产生的原因进行了分析(《当代中国社会腐败现象的人性分析》,西北大学 2008 年硕士学位论文);卜宇从社会学的维度对中国转型期腐败生成的根源

进行了探讨,认为社会转型中缺乏界定的新的财源和权源是腐败滋生的源泉,权力拜物教和金钱拜物教交杂成为腐败的观念基础,社会转型中控制模式的滞后性使腐败成为现实(“社会转型中腐败原因的社会学思考”,《江海学刊》,1996年第2期),等等。后者对转型期特定领域如行政、司法、国有企业等领域的腐败,以及特定对象如基层公务员、地方政府、小团体等的腐败,乃至特定的腐败现象如权力腐败、权利腐败、“权力夫妻”等产生的原因进行了分析。

二是对中国社会转型期腐败现象的特点和表现形式的研究。尽管关注的侧重点有所各异,但是国内学者一般还是从腐败行为的构件如腐败的主体、客体、动机、手段、后果等方面对社会转型腐败现象的特点、表现形式进行概括和总结。如辛向阳强调随着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和变迁,当前腐败现象呈现出群体化、高管化、巨额化、期权化、潜规则化、国际化和新型化等特征(“当前我国腐败现象的新特点与反腐败的对策”,《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10年第5期)。有的学者还对社会转型期不同阶段腐败的特征进行了比较分析,如黄百炼认为在改革开放初期腐败的特征为体现了以解决个人的某些具体问题为目的、受贿以实物形态为主、发生的环节为进出口部门、发生的主体多为党政一把手、手段为利用计划物资和紧缺商品的调配权力等方面;在两种体制并存时期腐败呈现的特征为对私利的追求由实物转向货币形态,利用管理和法制的空档进行,城市较农村严重,腐败者的行为隐蔽;在市场经济建立初期腐败体现出发生环节普遍,涉及面广,多发生于垄断和金融行业,集体犯罪增多,重大特大案件和领导干部违法乱纪增多等的特征(《遏制腐败——民主监督的程序和制度研究》,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另外,一部分学者对转型期特定领域或特定对象的腐败现象如国企、司法和行政等所呈现的特征、表现形式进行了剖析。代表性成果有杨宝利的“当前企业腐败现象的主要表现、特

征、原因及对策”(《求索》,1995年第2期)、张太元等人的“当前司法腐败的特点、成因及对策”(《湖南公安高等专科学校学报》,1998年第Z1期)、石东坡等人的“论当前我国行政腐败的成因、特点和对策”(《石家庄职业技术学院学报》,1999年第4期)等。

三是对中国社会转型期腐败危害性的研究。从国内学界的相关成果来看,学者们普遍认为转型期腐败所带来的危害性集中体现为危害经济建设、危害党风和社会风气、破坏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危及国家政权稳定。另外,有些学者还从某些特定方面探讨了腐败的危害性,如从权力规范行使的维度,杨永华认为腐败直接妨碍了公共权力的正常运行(《中国共产党廉政法制史研究》,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李福安从共同富裕的维度强调各种腐败大大加剧了我国经济转型中的贫富两极分化(“我国经济转型中的两极分化与反腐败”,《湖北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4期);李旭东等人着重从党的建设方面探讨了腐败的危害性,指出腐败严重腐蚀着党的肌体,毒害了党群关系,降低了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威望;朱晓华等人则从政治参与的可持续维度阐述了腐败的危害性,认为腐败严重影响了人口、资源、环境三大要素之间的合理配置,相应地导致了公众参与的不可持续性(“我国社会转型期的腐败对可持续发展的危害”,《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00年第10卷),等等。

四是对中国社会转型期如何预防、遏制腐败的研究。在反腐败的对策方面,综合国内学者的成果,基本上表现为加强思想教育、深化体制改革、健全监督机制、完善法律制度、严格党的建设、借鉴他国经验、密切国际合作等方面。另外,一些学者对目前反腐败急需解决的重点难题、障碍也进行了探讨。如何增科认为根本还在于发挥制度从源头上预防和治理腐败的功能(《反腐新路——转型期中国腐败问题研究》,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版);杨晋川强调转型期要取得反腐败的成功,必须要首先回答和解决反腐败

的性质问题(“论我国现阶段反腐败斗争的性质”,《马克思主义研究》,1996年第6期);汤月明强调要破解反腐败过程中所存在的诸如信心不足、顾虑重重、消极应付等思想障碍(“当前影响反腐败斗争的思想障碍及对策”,《南京理工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7年第4期);等等。

从上述目前国内学界关于中国社会转型期腐败现象及反腐败对策的研究成果来看,他们一般能够密切联系中国当前社会转型的特征来分析和阐述问题,同时对西方民主政治思想也能采取辩证理性的态度。他们的研究成果乃至研究思路既有助于我们深化认识当前社会转型期腐败的危害性,也为进一步深入探讨当前反腐败的有效路径提供了有益启示。但总体来看他们在研究转型期腐败滋生的原因时又更多地采取了定性和静态化的方法,即过于笼统地将社会转型期新因素的不完善和旧因素的残余视为腐败滋生的原因,而没有给予具体动态的分析,从而一定程度影响了所提反腐建议的现实针对性。毕竟转型期政治生态环境本身处于一个动态化的状态,在从1978年到目前的三十多年体制转型中新旧因素都经历了一个彼此消长的变化过程,同样党的权力运行体系也根据政治生态环境的变迁进行了适时具体化的调整。这些就要求我们对诱发腐败的因素乃至权力运行体系本身调适过程的得失等方面,务必根据这三十多年不同阶段的具体情况进行一个定量和动态化的分析,以真正把握好诸如政治生态环境中诱发腐败的真实性和主导性因素是哪些,以及党的权力运行体系经过三十多年的调适还有哪些不足等“脉”,从而为彻底预防和遏制新形势的腐败现象和行为开列出正确的“药方”。正是基于上述考虑,本论著在考察1978年以来改革新时期党的反腐败政治体系构建的历史实践时,并没有采取总体定性和静态化的方法,而是将转型时期分为三个小阶段,具体考察这三个阶段中伴随生态环境的变迁各自存在

着哪些诱发权力异化如腐败现象和行为的真实和主导性的劣变生态因子;另外,具体分析三个不同阶段里党的权力运行体系尤其是反腐败政治体系在适应具体变化的环境而进行的调构中,各自又存在着哪些得失,最后概括出改革新时期反腐败政治体系构建的具有普遍性的东西以及一些不足,相应地提出一些建设性意见。

九、关于政治生态学理论和方法的研究

20 世纪 60—70 年代后,在人类社会取得日新月异的进步同时,人类与自然环境的生态危机也日益严峻,环境生态与社会发展的关系逐渐成为理论界研究的热点。伴随着理论界相关研究的深入,其研究趋向也从原来的环境生态研究引入到运用生态学观点、方法对社会政治现象的研究。如在国外最为典型的为 1961 年雷格斯出版的《行政生态学》;在国内较为代表的是王沪宁所著的《行政生态分析》和王邦佐编著的《西方政党制度的社会生态分析》、《中国政党制度的社会生态分析》等。另外,一些学者尽管没有使用“政治生态”或“生态政治”诸类名称,但是注重把政治系统看成一个有机整体,运用生态系统的观点理解、把握政治机体的内在结构和联系,如戴维·伊斯顿的杰作《政治系统:对政治学现状的探讨》、《政治分析的框架》、《政治生活的系统分析》等就是代表。实质上,这也是政治生态理论的一个重要的理论来源和表现形式。20 世纪 90 年代后,政治生态(学)的研究呈现出方兴未艾之势。从国内外的研究成果(主要以国内研究成果为参考)来看,集中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对政治生态(学)内涵的研究。从当前学术界相关研究成果来看,对“政治生态(学)”内涵的界定主要有以下三类:一类为将政治生态(学)与生态政治(学)等同,认为它们都是运用生态学的观点研究社会政治现象的一种理论和方法或交叉学科。如《中国大百科全书·政治学》(张友渔,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1992 年

版)、《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戴维·米勒,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政治学辞典》(王邦佐,上海辞书出版社2009年版)就是按此对政治生态(学)进行的定义。第二类将政治生态(学)定性为把生态环境问题提到政治问题的高度。如陆聂海指出所谓政治生态化,就是要使政治与生态环境的发展一体化(“生态政治和政治生态化刍议”,《中共乌鲁木齐市委党校学报》,2007年第4期)。刘京希将政治生态(学)视为广义的生态政治(学)的一个重要层级或组成部分(《政治生态论——政治发展的生态学考察》,山东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三类认为政治生态学不同于生态政治学。持这种观点的人一般认为政治生态学与生态政治学之间既有区别,又有联系。联系在于两者都是一门交叉学科,都强调政治学与生态学或者生态学与政治学之间存在某种关联;区别在于生态政治学是从研究生态问题“发家”的,而政治生态学是从生态学的视角研究政治问题。代表性成果有芮国强的“生态政治学概念辨析”(《学术界》,2003年第4期)、吴海晶的“生态政治学论略”(《东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2期)等。

政治生态学与生态政治学虽都强调政治学与生态学之间存在某种关联,但毕竟两者之间有区别,无论是思考和探索问题的侧重点乃至解决问题所要实现的目标等都具有差异性。上述的第一、二种观点都直接或间接地忽视了两者的区别;而第三种观点认识到了两者的差异,却一定程度上轻视了它们之间的一些联系。本论著所引用的“政治生态(学)”概念在内涵上更偏重于目前理论界所认为的“政治生态(学)不同于生态政治(学)”这一派别的思想,但同时也借鉴和吸取了“政治生态(学)等同于生态政治(学)”这一派别中的一些思想,如国内学者刘京希在《政治生态论——政治发展的生态学考察》中有关将生态政治理论的研究在内涵和外延都给予丰富和扩大的理念,即把前者从以对自然生态的维护为中心转变为以政